

李鴻章政術憑藉之機緣網絡

王爾敏^{*}

摘要

在晚清政治舞台李鴻章是一位重要人物，世有論者，不一而足。

李鴻章生平行事，雖是當國重鎮，却非一帆風順，雖受清廷倚重，却非掌握大權。故評論人物，自不能輕下論斷，當須進而考察，建立真知。蓋李氏雖是一代偉人，所涉政事亦繁駁複雜，勢須就此一代宏觀細考可稍得澄清。

本文就李氏起家科名，躋身高位，乃是一路崎嶇，而在潰敗傾覆之後，隨外在機緣，憑個人才識眼光，而得掌握進身良機，始能獲致後日成就地位。乃能見到無論雄才大略，飽腹經綸，而外在機緣仍是十分重要。

李鴻章中進士，又選為翰林，任事作官，此是根本資履。若在承平，久在京朝，前程自是光明。所謂金馬玉堂、仕宦坦途，憑其才學可晉至高位。

世人未料，1850 年太平軍廣西起義，迅速打進長江流域，數省受擾而終打下金陵，建為天京，凡江左、湖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俱受太平軍襲劫，清廷除派旗、綠營大軍進剿，又於 1853 年令京中官吏回故鄉召兵勇隨官兵助戰。李鴻章即以翰林院編修遣其回鄉帶兵助陣。須知凡此官員受命回鄉，兵須自召，餉須自籌，主要奉聖旨，可以在家鄉召兵徵餉。曾國藩奉命練兵，亦不出此背景，大抵此類文官練兵保鄉，成敗全看才幹毅力，實僅有曾國藩苦撐未敗。李鴻章召兵不能多，籌餉難足用，雖親戰陣，有勝亦有負。而終於餉竭兵潰，喪其所有。苦戰五、六年，完全歸白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費，家宅被焚毀。終在 1858 年遁避江西、南昌。李鴻章自是空拳孤注，於 1859 年初投效曾國藩湘軍，任其幕僚。其時湘軍親敗，大將李續賓戰死，國藩六弟國華同殉。湘軍喪敗之餘，正逢逆境鴻章來投，却是彼此相濡以沫，共嘗甘苦。

曾國藩帶兵八年，兵未潰，志未懈，終在 1860 年清軍主力在金陵潰敗，太平軍乘勢席捲江、浙。朝廷不能不重用曾氏湘軍，授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自是湘軍得以發展，而李鴻章亦隨之受到重用。曾國藩為規復江蘇失土，乃保荐李鴻章為江蘇巡撫，由道員直升巡撫，乃是一步晉身疆吏。

湘淮軍合力平定太平軍之後，接著北方近畿各省捻軍勢力擴大，並在 1865 年在山東圍攻主帥僧格林沁並加以殺死，朝廷震驚，終於先後任曾國藩、李鴻章為欽差大臣，乃李鴻章平定東捻西捻，李氏得任協辦大學士，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

未料 1870 年發生天津教案、法國駐天津領事被殺，法國、英國、比國、義國教士修女多有被殺，法國聲言派兵來華作戰。清廷緊急促調李鴻章帶淮軍來保衛京畿，並調曾國藩回任兩江，調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本來中法可能開戰，但西方發生驚動世界之普法戰爭，使法國無力東顧，李氏到津，遂以和平方式解決天津教案，自此坐鎮北洋，清廷付予承擔外交事務兼管南北洋沿海沿江防務，其名位僅是地方總督，而責任須顧國防外交。當此列強環伺，二十五年間掬盡心血於為日，對法、對俄、對英之各次重大交涉，最後則對八國聯軍，亦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李鴻章在同治九年（1870）即覺悟到中國必須變法，但只與丁日昌在信中討論，不敢向朝廷建議。清廷只令其看守大門，有重責而無實權，想做之事復多掣肘。對外敗辱，豈能歸咎李氏一人？

關鍵詞：晚清、李鴻章、曾國藩、淮軍、湘軍

一、引言

歷史事實呈現，有隱有顯，有能見者，有不易察者。研治之必有困難，未必能一一追考，而得正確知識，則史家責任，實是重大。

但凡研治歷史，無論人物貴賤，事體大小，史家所當用心者在其意義之可貴，在其影響廣遠深澈。則無論事體大小，人物貴賤，而可資後世之取法取戒，自為治史者所負天職。若韓愈之寫《圯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所寫《種樹郭橐駝傳》，而傳頌千古者，自是在於訓世激勸之功，人物所為鄙事亦可貴也。

惟人物萬殊，史事變幻萬端，脈流無數計，途程轉折多，但凡研究一時一事一人之實，殊非易易。史家披揀採擇，亦自繁難萬分，藉其才學，或以駕馭之，亦未必盡致周全，只觀表面史事，勢尤不足以裁斷後果與其影響。若其先抱成見者，自不免移的就箭，自我作故。今世所見多矣。

民國以來，自梁啟超起，演論李鴻章者至眾，然論斷南轅北轍，彼此牴牾。此所難免者，蓋由李氏所當時會正值內亂外患相乘，在紛繁世局中陶鑄而成其權勢地位。當世輿評，身後議論，實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惟李鴻章為十九世紀一代偉人，史家終是難於擱筆不問。

熟見當代研究李鴻章之學者為數不少，無從備舉，鄙人非趕潮流，不期然早已涉入此一論域。吾於 1963 年刊布拙著《清季兵工業的興起》一書，業師郭廷以量宇夫子即命我研究淮軍，開始即囑命撰寫《淮軍志》，原非我自行發掘，自作主張。然我在斯年冬季赴英國遊藝兩年，重心全放在研究基督教史，因是直到 1965 年秋返國之後，始能着手研究淮軍，勢必研究李鴻章自初始進身仕途謀事功等情，詳為論述，乃於 1966 年撰成初稿呈交郭夫子詳閱，得其潤色而於次年（1967）出版，在初稿完成後，亦曾寄美國哈佛大學請劉廣京教授詳閱，我與劉先生向未謀面，得其鑑賞願為《淮軍志》作序。拙著既問世，吾遂自信所作李鴻章研究被

世人肯定是有所貢獻。拙著問世已四十餘年，一切論述，自可復按。

李鴻章是晚清一代重要人物，當今學界重視，大抵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包括鄙人在內，無論台灣、大陸、美國，均有人從事研究並刊布著作。所知台灣一切有李守孔教授、王家儉學長、雷祿慶先生各自有其專著。大陸方面所知不全，惟能見及戚其章、苑書義兩位之書俱已購得，此外尚得到《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二輯所收載一批有關李鴻章之研究文章。凡此俱集中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以至世紀之末。而唯有美國方面我敬重的劉廣京先生着手研究李鴻章之自強事業是在我之先，因乃將拙著《淮軍志》稿寄呈請教。環觀中外應以劉廣京先生注重李鴻章研究，時時相告研治重點，督勸我續作研究。我以師長之禮敬戴劉先生，承其諄諄示教，未敢有負其期望，蓋為思考論題，謹慎將事，多年前想到做此專文，早已撰就題目，如上所開，遷延多年，而劉先生亦已逝世，將不能求教指正，真是憾事。今撰此文，定作懷仰紀念可也。

鄙人思考此一論題多年，蓋凡治政治史，其中衍曲多變，人物穿插，鉤心鬪角，迴環激盪，世勢難測，頗費史家考索解析，却亦深具趣味。

古今政治人物，帝王將相，莫不施展政術，以馭繁難，雖聖人亦不能放任卧治，漢初黃老之治，亦政術之一種。故鄙人選題並不新奇，只是用於談論李鴻章而已。今既強為一試，尚祈高明之家能給予肯定。

二、翰林出身奉旨辦團投效湘軍漸當大任

大至世界，小至家族親友，個人一生，俱得起伏於外在環境牽引推移，端看人力才力，知識眼光，以因應環境動向看掌握輪轉，成敗得失殊不易把握，包括飽富人生經驗之人，亦不能趨避世勢遷流之影響，吾在大學讀書，國文老師陳致平講授曾國藩二十八歲所寫之《五箴》，順便引敘曾氏生平相信運氣。有謂「不信

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此說難見於曾氏各類著作，惟能知其歷見官場同僚，有人精勤憤勵，獻身國事，而不獲上意垂顧，沉淪下位。所指朝中所見，忠勵任事者，每遭責斥，碌碌無能，身名俱泰。心中實有不平，而常流露。然則總體看來，曾國藩運氣不壞，若不遇到太平天國起義之亂，曾氏何時能夠進致侯爵？兩度作欽差大臣，為平粵平捻最高統帥。但是多年苦撐，戰將相繼陣亡，湘軍領袖能夠有十六位身任封疆大吏（地方督撫），乃是出死入生百戰不撓而有，非碌碌之輩而取得，毫無倖進之事。

若論李鴻章，亦得藉時勢運會，方能磨勵因應，而能位至通顯，自非微倖可達也。

李鴻章志識堅卓，才華縱橫，第一個有利憑藉，即是父親文安中進士而任官京師，做京官有通籍身分，使李鴻章得秀才資格考順天鄉試而中舉。第二個有利憑藉，乃因李文安與曾國藩同為道光十八年考進士，使鴻章以年家子身分列為曾氏門弟子，受其訓誨陶教，自此結為師生。得數年薰陶，而能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考中進士，館選為翰林院庶吉士。自是起進入仕途，作為京官。¹即到道光末季改任翰林院編修。清代政府最重視翰林出身，號稱金馬玉堂，備朝廷識拔，將大有可為。

若在平时，李鴻章定留京朝求進身，未料時勢由平靜轉入亂局。道光三十年太平軍起事，由廣西入湖南迅速出江，佔據金陵，定為天京，南方各省俱受侵擾。咸豐二年，若干京官奉上諭回籍辦理團練，以助官兵平亂。侍郎曾國藩即受命回湖南辦團，又有命侍郎呂賢基、編修李鴻章、郎中孫家泰等回籍辦團守衛地方。於是諸人自當奉命前往，回安徽辦團。²

拙文非巨著，立旨在論析世勢機緣造化，人事關係交織，李鴻章得以因應利用，施展政術，以推動庶政，建立功業，維繫權位。而翰林身分，即是極重要之一個條件。自是憑恃真才實學，

¹ 李鴻章自小考鄉試以至會試而取得翰林身分，史家作傳，多必載述。惟多不談李氏江南鄉試原未考中，方選擇順天鄉試。本文所據引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19。

² 苑書義，《李鴻章傳》，頁21-22。

乃是原始根基。

翰林出身亦非必能致權位，承平之際，仍多留滯京洛，常居閒曹。其例不勝枚舉。但一遇天下亂局，內亂外患紛至沓來，凡此機運，即是難倒庸懦磨礪英豪之運氣。

咸豐初年，既有太平天國起事倡亂，又有皖北捻眾流竄，安徽省屢受其擾，朝廷固自派遣統兵將帥前往會剿，若周天爵、李嘉端、福濟等，乃歷任之巡撫，有守土之責。若和泰、吉順、舒興阿，乃特遣兵帥，進剿太平軍者，所領旗兵馬隊、綠營防軍，俱是國家經制軍，有政府協餉接濟。至於由皇帝諭旨派令京官回其本籍辦團，說來不免荒唐。其一，俱是儒生文官，全不知兵。其二，由派出之官回鄉募勇，此所謂勇者，不同於兵，原無正餉，政府全不提供，勇由其募，餉由其籌，朝廷所委之責要在鄉土與賊兵交戰，而並不供給任何接濟，必須追隨當地兵政受其指揮調度，須打勝仗，方可保升官職。一般辦團，俱如此辦法。看去是一機緣，做來是一難題。若呂賢基雖是侍郎，而一介書生，不知兵事，進於險地，空拳孤注，只能送死。因是呂氏去守舒城，果然城陷，怎擋刀兵，只有投水自盡，事在咸豐三年十一月。死後雖有諡名，對其個人只是殘忍。

李鴻章回鄉辦團，自咸豐三年至七年，前後帶團倚從周天爵、李嘉端、福濟三位巡撫，尤其福濟乃是丁未朝考副主考官，為李鴻章坐師，似可依以建立功業，福濟實無所作為，終被撤換由翁同書接任。李鴻章帶勇數年有勝有負，亦有潰敗，深覺帶勇不易，主要餉糈難濟，兵少力薄，怎能致勝立功？五年閱歷，辛苦備嘗，功名利祿，仍是遙不可及。終於咸豐八年舉家避居江西南昌，其心情之空惘可知。³

³ 苑書義，《李鴻章傳》，頁24-32。按：史學大師劉廣京先生重視近代之李鴻章，吾有幸承其識賞，時相屬自各方面作李鴻章研究，承他特愛，時加敦教。惟劉氏早約其門人後學在美合寫一書，題名：*Li Hung-chang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包含論文十三篇。乃經復旦大學陳絳教授譯為中文，書名是《中國近代化的起始》，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吾有此書）當此時會，研究李鴻章者已成風氣，台灣有李守孔教授、雷祿慶先生各有著《李鴻章傳》，俱在七十年之間。然大陸學者亦在八十、九十年起而研究李鴻章。觀點趨於就史料論事，值得重視，吾手中有

李鴻章家鄉故居被焚，於咸豐八年九月闔家避難移居江西南昌。李鴻章豈可閒居素餐？適此時湘軍三河新敗，事在八年十月，湘軍主力李續賓部七千人全軍覆沒，曾國華與李續賓同時陣亡。湘軍只此一大枚精銳之兵，受到挫敗打擊，幾難復振。曾國藩駐軍江西建昌，震慄悲傷集於一身。百戰勁旅，遭此大敗，自得曾國藩重新整頓，再圖自立。

曾國藩於咸豐八年九月九日進駐建昌，在此同月之內，而有李瀚章、鴻章有來南昌會見之信。曾國藩於十月初一日致書郭嵩燾有謂：

筱泉家被賊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內亦即來營。少泉亦約來此一敘。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古人不余誣也。⁴

曾氏簡短數語，涵容至全。看似平常，實可追記李鴻章加入湘軍之關鍵線索，相當重要。

李鴻章自南昌赴建昌，一路有消息告知曾氏，曾氏日記並有記載。李氏路過廣信，與同年沈葆楨相見，沈氏亦有信告知曾國藩。十二月初十日，李鴻章到達建昌大營，曾氏連日與之暢談。正見對李鴻章之接納器重。一般而言，李鴻章當是自此加入湘軍。⁵

鴻章兄長瀚章亦是曾國藩門人，已早於同年十月二十日先到建昌大營，多日相與深談，鴻章到後，曾氏與之亦連日深談，當必進而了解六年來（咸豐三年至八年）鴻章在皖北帶勇打仗之經歷。

寫到此處，實有一些不見文字記載而須加以申解之點。願據所見論析如次：

一則，曾李雖有師生關係，鴻章亦多受曾氏器重，但在清代

1991年刊印，苑書義所著之《李鴻章傳》，其書亦引據拙著《淮軍志》，註中一見，其實則有多處取自拙書，識者俱可對照覆索。

⁴ 王爾敏，《淮軍志》，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專刊（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頁43小註所引《曾文正公書札》卷六；頁33-34。

⁵ 王爾敏，《淮軍志》，頁28，小註備詳。

官場體制習慣，若要徵之入幕府，勢必採行一道下關書手續，鴻章相約來見，不是一進門即算入幕，此來拜見老師，不能妄想作何安排。相信即在八年之末，曾國藩正式下關書付給鴻章，方始視為入幕。鴻章接到關書，自當承接一定任務，而為湘軍効勞。此雖不見於文字記載，乃是決不可省。清代地方大吏開府建幕，本是常態，無時無地不有，只能偶而見之記載，實以常有之舉，遂多予提示。台灣已故政治史學者繆全吉教授著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可供參閱。⁶

二則，咸豐初年不少京官受命返鄉辦理團練，多是局面小，兵力單，只是跟隨官軍小作配合，而難成大支勁旅，自立不拔，只有湘軍一家，尚能應援各地，與太平軍作戰周旋，雖連年折損大將，而終能堅苦維持，自實在於領袖曾國藩、胡林翼之才德毅力，方足以遇險不驚，遇敗不餒，而能忍辱負屈，堅苦支撐。人或謂曾胡二人俱是翰林，實有才學定能勝任，此一假設不能成立，須知同時翰林領兵者甚多，若呂賢基、李孟群（李鴻章同年）、帥遠嶧（鴻章同年）俱是翰林出身，而不能建立戰功，此則在因人而異，曾胡兩個翰林，仍是憑恃識見才略，非他人所能及。其實二人所面對之難題，與應付戰陣之外，尚有清廷之薄待岐視，並不看重湘軍。一切當時明眼可見，清廷皇帝，視湘軍如偏師，其面對太平軍之兵力全倚重江南大營，重兵七萬，集於天京城外，各省協餉充盈，尤以江浙財賦支援江南大營，供餉遠遠優厚於湘軍。湘軍各枝統將，領兵俱不過萬，大枝李續賓勁旅，始終在七、八千人之間，另一大枝劉長佑，時多在六千左右。曾國荃一枝、李續賓一枝、鮑超一枝，亦不過數千人。曾國藩多未直接統帶萬人，亦只在可以指揮各軍而已。作戰多年，紛援各地，並無地方實權，只是到處作客而已，一切尚須接納各省督撫，雖已成軍七年，足以自立，而仍是一枝偏師，朝廷不予重用。李鴻章亦是辦團五年，終於全歸徒勞。可謂是窮蹙孤寒、喪其所有。遠走南昌，仍是赤手空拳。今投效湘軍，自是又一契

⁶ 繆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台北：中國人事行政月刊社，1971）。

機，而未來如何，實亦難料，曾國藩自己亦毫無把握。吾人論史，必須說明此處。既談機緣，不能不加點明。

所知李鴻章在八年十二月到建昌之後投效湘軍，可見曾氏日記中記載，咸豐八年幕府中人物有李瀚章、許振禕、郭筌陔以及李鴻章等人。所以知李瀚章入幕，曾氏自稱為本營之人，何以知李鴻章入幕？十二月十九日曾氏日記「令少荃寫二信」，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午飯，相招同席之人為李鴻章、許振禕、郭筌陔，外加客人李元度。自當認定李氏此時已為湘幕一員。尤其曾氏在度新年住進建昌知府府署，有李鴻章等人同其度歲。⁷

咸豐九年元旦，曾國藩率領建昌太守、縣令及湘軍文武，包括李鴻章、李元度等人早起望闕向皇帝朝賀。中午即大宴同僚，均載入日記。所載人物營中幕中不過數人，鴻章已大名在列，自見器重。⁸

國藩既在建昌度歲，開年初七日即思考離開建昌，進駐江邊，實則駐建昌不過三月而已，移營江邊，便於水陸呼應，亦易指揮各軍行動。曾氏似早在年初表明此拔營他去之故而初八日即有建昌太守及縣令率鄉民前來挽留，要打消曾氏他去之意，得使國藩未能立即啟行，將日期推後至正月二十日離開建昌。在正月十一日李鴻章要先回南昌，曾氏順便賦予招募皖北馬隊五百人來營。可見其日記所載：

李少荃回江西省（南昌），令其專人至潁亳一帶，招勇五百，試操馬隊。如其可用，再行續招三千。⁹

於此日記，可見曾氏重用李鴻章帶兵，以及淮勇之繼起，其萌生因素，此為最早。李鴻章之機緣遭遇，此是重要起點，隱然存於曾國藩意念之中。咸豐九年三月十八日，鴻章回到湘軍大營，繼續備幕府之一員。

⁷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嶽麓書社，1987），頁336-338。

⁸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頁345。

⁹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頁348。

清廷中樞政府，皇帝咸豐作主，對於剿征太平軍之謀畫，原自本其權術方針，重心主要置於包圍天京，其為全局重心，傾綠營重兵數萬，付之江南大營，各省提供協餉，江浙兩省以為後援，糧餉充足，供給優厚。曾國藩不過一域偏師，怎能望其項背？自是多年轉戰各地，不憚損兵折將，與湖北胡林翼合作，艱難維持，尤對朝廷之卑視薄待有百屈含辱之痛，存蓄胸中。李鴻章到營相助，倚靠幕僚，不過同心合力，維持不敗不散而已，能先自立，方有未來。

湘軍三河戰敗之後，仍有名將折損，張運蘭、劉騰鶴俱戰死江西，國藩十分傷痛，然至咸豐九年十年之間，潛山、太湖吃緊，太平軍大舉來犯，勢將重演三河之役。而曾國藩、胡林翼面對此局委令多隆阿、鮑超、唐訓方以主力抵擋太平軍十萬之眾，終於未敗而擊退陳玉成大軍。由是湘軍聲名復振，多龍鮑虎之譽傳之朝野。凡此前後轉戰，李鴻章俱隨曾國藩身邊。¹⁰

湘軍多年苦戰終於等到機會，咸豐十年閏三月十五日江南大營經太平軍十道反攻，血戰八晝夜而全軍潰敗，提督張國樑戰死丹陽，欽差大臣和春傷死墅潞關。太平軍疾驅直下，席捲江浙首善之區。清軍綠營主力瓦解，清廷大為震驚，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務。湘軍苦戰多年，乃有此一機緣。而湘軍自此壯大，則亦是李鴻章一個出頭的機緣。曾國藩之重大規畫戰略，自然提供李鴻章任事機會。¹¹

三、湘淮兩軍系之合作

向時十年來清廷對太平軍之橫掃南方各省，漫延甚廣，然其戰防布局，重綠營之防軍，而輕視薄待湘軍。湘軍起於團勇，看

¹⁰ 王爾敏，〈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於湘軍之維繫〉，載《清季軍事史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96-139。

¹¹ 王爾敏，《淮軍志》，頁1-3。附列，李鴻章入曾幕之行動日期：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到湘軍建昌大營。為投效湘軍之始。五月初十日隨曾國荃軍至景德，歷練湘軍戰法，但與國荃不相能。七月初一日再回曾國藩大營。有求去之心短時離營，國藩上疏朝廷奏留。至是始再回到湘軍任事。直至咸豐十一年尾受命招練淮勇。中間有出有進，不具列載。

來只是偏師。而所擔當戰局包括粵、桂、湘、鄂、皖、贛六省。十年轉戰，將帥屢折。真是苦撐，僅有湖北主政為湘軍胡林翼擔當，曾國藩迄未得寸土可恃，其下名將更無機會。朝廷待之真是升獎不優、恤賞不泰。能戰之將：江思源、江思濟、羅澤南、王珍、李續賓、劉騰鴻一一陣亡。咸豐六年後起之將僅有李續宜、鮑超、多隆阿、曾國荃，俱成名於咸豐十年之初。而今江南大營兵潰，湘軍受到重視，曾國藩受命為欽差大臣，總攬戰防全局，以其現有兵力，怎能當此重任。

曾國藩新奉朝命，立即思考規復吳會、保全江、浙兩省。但一切均需人才兵力。胡林翼最見機先，即與曾氏函度規吳大計。胡氏七次建言重用李鴻章任淮陽之長，練水師保障江北，為入吳先驅。曾國藩自先經營皖南，但為先練淮陽水師，而重用李鴻章，事在咸豐十年。¹²當然曾氏亦首先重用李元度駐徽州保障皖南，備為進軍浙江。凡此二李，俱為最先提拔之人，亦置於重要之地。李鴻章乘湘軍擴大機緣，自全出於曾國藩之引重擢拔，實可明見。

曾國藩老成持重，雖承當龐大局面，而開拓實顯不足。除二李之外，亦請左宗棠自湖南招兵出山，準備一枝入浙湘軍。大抵為顧後路湘軍舊有主力仍須守住兩湖江西，同時用自己主力曾國荃軍進圖安慶。凡此俱見曾氏用兵之穩，非不能大加擴充，蓋因已無可用之將才，不能輕易使任。隨後李元度竟敗潰而失徽州，使國藩陷入祁門之危，正見選將之不易。¹³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國荃克服安慶。曾國藩即移營安慶，計畫向長江下游進軍，順江向下，即須用到淮陽水師，又須附以陸上之兵，此一任務自然落到李鴻章身上。起初意在配合曾國荃向

¹² 王爾敏，《淮軍志》，頁13-25，曾國藩之總制兩江及規吳計畫。

¹³ 曾國藩既受命為兩江總督，隨即奏保李元度為皖南道，實缺。正見提拔最親信之將，放在優先安排。其時胡林翼亦有信致李元度，可怪者《胡文忠公遺集》編排之人將其信排於致李鴻章信之後半，後世專家學者寫《李鴻章傳》者俱未看出。前段說與李鴻章，後段說與李元度。望治軍事史者小心考察為要。鄙人撰《淮軍志》只引前段，不用後段。

下游城鎮逐步用兵，隨後有另一轉機來臨，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上海官紳龐鍾璐、殷兆鏞、潘曾瑋、顧文彬，及地方官楊慶麟、潘馥有乞援專使錢鼎銘及厲學潮到安慶大營乞請大兵進援上海。錢氏竟哭泣求告。而求援文書亦使國藩感動。曾氏為兩江上官，自無推諉之理，回告上海來使，非次年二月不能遣軍進援下游。¹⁴

援滬之事，稍有曲折，而曾氏熟慮，終將重任託付李鴻章，原計隨淮陽水師配合向下游進兵，逐步打通赴援上海之路，即因急需募齊陸上之兵，乃於同年十一月令李鴻章招集舒廬團勇集中安慶訓練。由是李氏承此指令而迅速招來在皖北活動之團練首腦張樹聲、劉銘傳、潘鼎新、吳長慶、張遇春，再加自湘軍撥予李濟元、程學啟各一營，又有滕嗣林、韓正國各一營，合成淮軍達六千五百人。兩月之間即已成軍。由上海官紳僱輪船載赴上海。再加上由陸路自皖北趕來上海之周盛波、周盛傳二人之團勇，合計最初淮勇當有七、八千人。其中自然有曾國藩所撥給之程學啟、韓正國、李濟元各營。曾氏更有大支持者，是代為組建淮陽水師及太湖水師兩支船隊（為黃翼升及李朝斌分別統領），自可見其對李鴻章倚任之專，相輔之誠。¹⁵

李鴻章不負所託，一到上海即一面作戰一面應付地方官紳，以及在華洋人、洋兵、洋商。向曾國藩表示已是千手千眼，十磨十盪之局。國藩知其才堪大用，力保署任江蘇巡撫，鴻章亦以每月協餉四萬兩撥付湘軍大營，以為報稱。

李鴻章到滬，首先拉攏原有之常勝軍將華兵助陣，另又改建軍中洋槍隊，使用新式田雞礮（即炸礮又稱落地開花礮），俱從洋人學得。用於戰陣有利。惟鴻章自須用兵自上海推向蘇常各地，尚須在上海應付洋人，而地方官紳若原來請兵之龐鍾璐（鴻章同年）、殷兆鏞等反成對頭，屢向京中控告鴻章貪權怙勢、剝削市民。皇上命國藩查報，國藩多加回絕。想見其對鴻章之厚愛。

¹⁴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頁674-677。

¹⁵ 王爾敏，《淮軍志》，頁26-62。

曾李二人雖有深契，而兩方各在用兵緊張之際，竟亦產生齟齬，吾相信咎在李鴻章，曾氏實多寬大。重要一事乃是在同治二年江北淮陽吃緊，曾國藩要調回黃翼升帶六營水師進援淮陽保護裏下河，曾李通函往返十餘通，鴻章終是推諉，絕不分兵相助，曾氏不滿可見於同年致左宗棠信：

少荃與尊處意見不合，此間竟無所聞。雲仙（郭嵩燾）由海道入粵，並未進皖。弟派太湖水師十營助攻蘇滬，而調淮陽水師六營由滬赴淮，以援義渠（唐訓方字）之急。函牘十返，少荃竟不遣一營入淮。鄙衷不無介介。以蘇州兵事方殷，未與深論也。¹⁶

另一旁證，見之曾國藩幕府趙烈文於同治二年八月初九日記云：

夜見李少荃信（指在曾氏營中）。（以下省錄原信）又見中堂（曾國藩）每月索餉四萬，及調黃翼升水師赴淮，意甚不平，牢騷滿紙。至有「東門黃犬，其可得乎」之語。殊覺逾當。¹⁷

不但當時有人不直於李鴻章，即千載以下，亦不可寬恕李鴻章。蓋在曾氏對李鴻章多年護持栽培，大力推輟，不但令其募兵投滬，更奏保其任江蘇巡撫、方面大員，而鴻章稍有自立，即生齟齬，施用手段不遵號令，實是有負於曾氏之栽培荐舉。後來李鴻章克復蘇州，並連連用兵復其他州縣，完成平吳之功。而湘軍曾國荃圍攻金陵，城大而堅，苦戰不能得手，朝廷督令李鴻章前往助戰，李鴻章以為湘軍以攻取天京為首功，不歡迎別軍前來，故而託辭遷延不赴，按兵不動，使曾氏兄弟攻下堅城，建立全局首功，此事亦頗感謝李鴻章之有意成全。正可見雙方實有合作默契。對於李鴻章避戰讓功，後人劉體仁著書有其簡要記載：

金陵圍攻不下時，蘇州已克，朝旨令淮軍助戰。李文忠遷

¹⁶ 《曾文正公書札》（線裝書），卷二十三，頁4-5。

¹⁷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二年八月初九日記。

延不行，顯然讓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場迎於下關。文正（曾國藩）前執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賴子全矣。¹⁸

於此記載，可見出湘淮兩軍本是彼此合作。

自咸豐十年四月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使湘軍得有發展良機，然龐大局面，自是繁難艱鉅。經過險境，至咸豐十一年八月克復安慶纔是立穩脚步。至同治元年分進江蘇、浙江，兵臨金陵外圍始見全面反攻太平軍之機，而疾速擴軍，惡戰江浙，使湘軍聲勢大振，國藩位尊權重，似此順境在前，竟使國藩惴惴悚懼，坐立不安，蓋已引起朝廷疑忌，京洛大員側目，包括相知最深之大學士倭仁即表面交好，暗中傾軋。曾國藩與江西爭餉，朝廷借故裁抑曾國藩，完全受制，終歸敗訟，國藩測知位高權重，已使朝廷不安，不免屢遭彈劾，尤且故意發交國藩閱看，以示儆訊。曾國藩多次訓告諸弟務要早作退計，讓出權位，不憚再三再四。自稱長江三千里，無處不張鄙人旗幟，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如此權勢，必遭天忌。古今人物位高權重者，往往一朝傾覆。身戮族滅，深怕諸弟受其連累，言之諄諄。天京攻下，紅旗報捷，國藩封侯，國荃封伯，自是家門鼎盛揚眉吐氣。然此大事偏不直接寄諭，而令江寧將軍富明阿事先通知，明白以將軍壓兩江總督，使之屈於將軍之下，曾氏得意之日然心情惴惴不安。原已多次上奏辭却兩江及欽差兩職，以閒職帶兵，為朝廷慰留，而今則知大功告成，狡兔死，走狗烹，下場難料。遂即決定遣散湘軍，釋放兵權，自是熟思之計。是以到金陵江督之位，立即遣撤湘軍，是久蓄之成算也。¹⁹

曾國藩久熟京洛，又帶兵十餘年，老謀深算，智慮過人，任地方官放棄兵權尤為明智。然為南方已定而北省捻亂熾張，見及

¹⁸ 劉體仁，《異辭錄》，載《清代歷史資料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4），卷一，頁38-39。

¹⁹ 王爾敏，《清季軍事史論集》，頁140-180，「曾國藩經營湘軍之艱難遭遇及其心理反應」。

未來兵事難了，而早先培植保荐之左宗棠、李鴻章亦已因功封為伯爵，勢須將南北軍事未了之局，推付二人分擔，國藩自能坐高位保令名而不被傾擠，亦為深熟之上策。因是不計較個人與二人已有齟齬，但就向時關係，仍是湘軍系之分枝，原為一家，自可彼此合作無間，攜手擔當南北防務，真乃勢使然也。

曾國荃攻破太平國天京（金陵），取得首功，國藩兄弟列爵，而立即遣撤所直統之湘軍，完全解下兵權。其時太平軍尚有大枝餘眾，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分布閩粵，則由另枝湘軍左宗棠、蔣益澧進軍閩粵，全力追逐。而曾氏遣撤所部自是一項明智之舉，蓋時已位尊權重，朝野敬而疑忌，不能久典兵權，免遭大戾。專做文官，皇帝可以放心。

人世所難逆測者，仍在機緣。左宗棠湘軍尚在閩粵軍事未了，而在同治四年四月，北省近畿發生重大事故，乃是縱橫北方魯豫四省之捻眾大股於四月二十四日在山東曹州圍困了欽差大臣僧格林沁之滿蒙大軍，僧格林沁突圍不成，終於戰死。事態嚴重，立即震驚朝廷。清廷對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倚為北疆長城，命為欽差大臣專事剿捻。竟然死於草寇之手。世人俱無從想到。如此一來，可使京畿不保，豈不嚴重？大責重任自然要落在曾國藩肩上。

曾國藩十餘年用兵，俱在兩湖皖贛，且多在長江以南。甚少用兵江北，尤其遠離黃河兩岸。想想山左山右是京畿兩翼，河南是京畿門戶，只能用親信僧格林沁力顧三省。曾國藩怎敢進卧榻窺禁嚮？此時則惟有曾氏聲威鼎盛，戰功最高。清朝實更無能將可恃，亦無所猶豫。朝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總制直、魯、豫三省軍務，一力剿捻。曾氏部曲既撤，遂即以淮軍二萬二千人為主力，自加小枝湘軍三枝，劉松山一枝率湘勇各三千人，合計八千餘人，要帶赴山東、河南剿捻。朝命於同時任命李鴻章任兩江總督，可保軍餉源源接濟。此固是曾國藩受大用，實亦李鴻章及其淮軍一個發展機會。曾李自然合作。湘淮兩系自是一家。²⁰

²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全二冊（台北：正中書局，1963），第一冊，頁

曾國藩遣撤湘軍是明哲保身，重用淮軍是高明謀略，處處時時愛護推重李鴻章亦是寬大度量，遠識灼見。基本上重在彼此援引相倚，可成大事。顯見其政治眼光之卓越。

湘淮兩軍合作剿捻，曾李二家合作共事，所面對流竄各地之捻股，出其意料，遠比對付太平軍困難，國藩函告諸弟明白承認看輕賊勢，與李鴻章同犯此過。淮軍勁旅連連受挫，損兵折將。朝命改由李鴻章接任欽差大臣、曾國藩重回兩江任總督以備後路餉源。終由李氏統領大軍應戰，捻匪竄入陝西，分為東捻西捻。朝廷再增派左宗棠追逐兩捻。再加鮑超霆軍助戰，各軍彼此意氣不合，各不相下。再加朝廷增派都興阿帶騎兵亦為欽差大臣，時有三位欽差，自見朝廷憂慮畿廷動盪，舉措乖方。事實上東捻為淮軍剿平，而西捻則為李、左、湘淮之兵力削平。表面彼此合作，內中諸多齟齬。終能削平大亂，自仍是湘淮兩系共有之成果，而曾、李、左俱已取得朝廷尊重。然當時輿情，後世評騭，頗有分歧，難得定論。

若論史上軍國政務，原即頭路紛繁，變化莫測，捻軍流竄六省，諸軍追逐，豈能必勝，爭功諉過，所在實繁，無從盡知功過屬誰，統帥有彼我之心，必不能免，必至產生齟齬。在此略提一二，實冰山一角，可以比觀考察即為線索。茲舉曾國藩致李鴻章書：

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宗棠）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霆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中齟齬之。²¹

觀此信，自可見湘淮彼此有意見。曾、李應早有明察，以論二人胸襟眼光，據史實所見，兩人自是長期合作，蓋相合則兩利，衝

466-467。又，據曾國藩日記，其奉到四月廿九日朝命督軍剿捻，已至五月初三日。有謂：接奉廷寄，知僧王於二十四日接仗失利，邸帥陣亡，命余赴山東剿賊，李鴻章署江督，劉卹膏護蘇撫。據《日記》一，頁1137。

²¹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一，頁25。

突必自毀，曾國藩最具遠識，言詞行動無不支持李鴻章，而李鴻章則確可證其有負於曾氏之師長厚愛。可以舉一二資料參考。

平心以論，僧格林沁之陣亡，是曾國藩得二次擢任最高統帥之機，曾氏離兩江任所，隨之給予李鴻章升任江督機會。曾氏遣撤湘軍重用淮軍實是淮軍建功機會。鴻章自知其利，惟帶兵用將曾李各有其方，淮軍不耐國藩之嚴，每有怨言，李鴻章須加切責派將用命，却反對曾氏不滿，怨言出於李鴻章之一方。如同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潘鼎新云：

兵出境由人調遣，窒礙殊多。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諸將頗有後悔。（指歸曾國藩調遣）鄙意更不敢輕派矣。²²

李氏所為此言，正見其違背湘淮軍合作共事之誼，有負於曾國藩。

曾國藩統帶各軍剿捻一年餘，未見成功，朝廷命其回兩江督任，而與李鴻章對調，由李氏任欽差大臣統兵剿捻，李氏性急不來親見而派人將欽差關防取去，對於師長及昔日幕主實是無禮之甚，曾國藩亦不免生氣。其時淮軍將領翰林出身之劉秉璋為曾氏大營參軍，俱加記述其情。茲為舉證：

文正（曾國藩）精力已銷耗，雖漫為布置，皆人人所能見到。旋奉旨交卸欽差大臣，仍回兩江總督任。意甚悒悒。合肥李文忠公鴻章急於任事。委候補道××取去關防。意尤不悅。並謂先文莊公（劉秉璋）云：我以為須當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又云：我固知回江督任勞逸安樂天淵，然我決不回任，仍須留營効力。或則開缺回籍養病。²³

²² 年子敏，《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32。

²³ 劉聲木（劉體信），《長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各十卷，民國十八年，直介堂叢刊刻本，此一處據《四筆》，卷四，頁6。

可見曾氏對李鴻章之不滿，已見諸辭色矣。雖然如此，湘淮兩系實亦無完全決裂之可能，曾國藩尤具遠識灼見。處處仍優禮讚譽鴻章，蓋曾氏居高思危，能輔翼之有力者仍是李鴻章，在當時回任兩江時致書李鴻章有云：「北征無功，而時局日危，真覺愧對江東。望賢者為我雪恥也。」²⁴

原是曾氏剿捻兵機多不順利，經歷一年，至同治五年五月過後，朝廷不耐曠日持久，每開始嚴令督責。國藩承受不了京中彈劾日起，決心表明辭去統帥之任，留軍效命，朝廷不允，而國藩不斷請辭。清廷終於五年十一月初諭令國藩回任兩江，代出李鴻章接任欽差大臣統合淮軍剿捻。原先五年五月曾國荃已接任湖北巡撫，上任不久。國藩已決解統帥之權，則仍護持淮軍諸將，於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函告曾國荃令其善待入鄂淮軍，語至諄切，表露湘淮一家之想，今舉其言：

此間現僅調周、張兩軍赴鄂會剿，五日內銘軍又可繼進。淮軍入鄂，請弟殷勤款接視之如一家眷屬。蓋年餘以來，諸軍雖未立大功，而其聽我之話，與聽少泉之話實無以異。弟若隔膜視之，則將領或疑我平日之不誠。²⁵

於國藩信中明言湘淮如同一家親屬，則知曾氏對淮軍之倚重愛護。有長者之風，對部屬有誠信，對李鴻章多有鼓勵稱讚，絕無惡言相加。正可見出其儒臣名相格局。可以推尊為文正公而無愧矣。

四、李鴻章所運用之機緣系統

如前節所敘，曾國荃圍攻金陵將攻破城池之數月間，統帥曾國藩已嗅到朝廷中樞政要之猜忌疑嫉。深慮功高權重，一朝傾覆。多次家書中早已頻頻告誡諸弟，俱可見其心情之起伏。

先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皇帝在熱河駕崩，遺命以怡親王

²⁴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六，頁10。

²⁵ 《曾國藩全集》，家書二（長沙：嶽麓書社，1985），頁1302。

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御前大臣肅順等為贊襄政務大臣，輔佐幼主載淳繼位。隨之九月二十三日兩宮皇太后自熱河行在由間道回京，而由肅順奉大行皇帝梓宮循官道回京，同日出發但兩宮皇太后早先進京。九月三十日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治罪。十月初六日賜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立決，其餘原五位贊談大臣革職，發往軍台。十月初七日又將載垣等黨援吏部尚書陳孚恩、吏部右侍郎黃宗漢革職永不敘用。其時即改年號為同治，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以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²⁶

似北京城發生之重大政變，其時曾國藩剛八月定駐安慶竟遲至十一月十七日方始得知京中消息（晚於十月初六日有四十天）。曾氏日記分載於十一月十七日及二十二日，茲引舉其十七日所記：

因本日見閻丹初（敬銘）與李申夫（榕）書，有云贊襄政務大臣八人中，載垣、端華、肅順並拿問，餘五人逐出樞垣。服皇太后之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相與欽悚久之。²⁷

曾國藩日記兩度詳記京中重大之政變，眼見兩個親王一個御前大臣，一朝戴罪受誅。曾氏自己尚遠不及其顯赫權勢，相較之下，自不免警惕於心，是以金陵克復，建立大功勳，位列侯爵，權傾一時。得意之極，却深懼一朝傾覆，必至身敗名裂。因是惴惴憂懼之下，遂作解散湘軍之決定，大將之典兵權，自古必遭橫禍，此即曾氏深思熟慮之識斷，非尋常之舉也。

曾國藩自咸豐三年起帶兵，以至同治三年克復金陵，算是久歷戎行，實亦浮沉宦場，部曲戰友，固自多忠勇可恃之將。而宦場中封疆大吏，最能和衷倚恃，互為協同者，只有胡林翼一人最具名望，最為可靠。但其人琴已亡，實如折翼。此外人才，當以曾氏一手荐舉，一力提拔之左宗棠及李鴻章二人當可恃為宦場黨

²⁶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376-381。

²⁷ 《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頁685。

援。二人之中又相信李鴻章較易和衷共事，故雖遣撤湘軍，而重用淮軍，相信其仍能呼應方便。此是曾國藩之用心所在。

相對以觀李鴻章在同治三年七月以後，一面遣郭松林、楊鼎勳入閩追逐太平軍餘眾，一面亦思考軍事前途或留或撤，根本想法自在求進而不言退。是以在同治三年九月上書曾國藩表明自願以淮軍部眾接受調遣用命。茲引舉其言：

敝部淮勇，能戰而多土氣。相從年久，性情熟洽，尚易用命。改隸別部，難得速效。如陳國瑞之粗莽，幾以叛逆相陷。此尤他人所望而裹足者也。（此指僧格林沁之鞭撻總兵陳國瑞事）惟師門若有征調，威信足相倚恃。敬俟卓裁。²⁸

此函重要，可見出李氏主動向曾國藩表明相倚合作之心意。則湘淮兩系合作，實為上計，自是一拍即合。後繼之平捻，果為湘淮合作之實踐。雖然彼此亦有不少齟齬，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曾李二人始終是保持合作，乃是常態。

同治七年七月東西兩捻平定之後，清廷引重曾國藩為直隸總督，用以拱衛京畿。調李鴻章回湖廣總督本任。自可見曾國藩備受朝廷倚重，亦可信釋放兵權可免除不少疑忌。而李鴻章則以擁有淮軍，仍極思有用武之地，因是同治七、八年間，清廷時而命其援黔平苗，又命其援陝平回。

按同治八年醞釀入黔平苗，同治九年決計帶兵入陝平回，俱出於李鴻章自願，李氏援陝尤其聞命即行，九年夏暑多雨，李氏已領軍行進河南，正遇豪雨，時在大營前大帥旗柱為暴雷所擊，一般相信不利主帥，李氏全不信邪，一意催軍冒泥濘前進，終於帶淮軍入陝，抵達西安。萬不料五月二十三日發生天津教案，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 V. Fontanier）被殺，英、法等教堂並受暴徒攻入殺死法人十七名、俄人三名、比人二名、英義兩國各一名。由是引致各國責難，法國並有出兵來華開戰聲明，事態極其

²⁸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頁35。

嚴重。清廷一面將三口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府、縣等人交部議處，一面命直隸總督曾國藩赴天津查辦教案。其時曾國藩力持嚴拿逞兇者治罪，並賠償洋人損失，以向法國道歉。而京中大吏極其憤怒不平，醜詆國藩軟弱，取媚外人。幾至群情沸騰。然國藩力主和平解決，不使大局決裂。而法使羅淑亞（Louis Jules Emilien de Rochechouart）不耐中國之遷延，決意請法國派兵來華，眼看戰劫將啟，京畿危殆。清廷乃於八月初三日命李鴻章速帶淮軍自陝西回援京師。隨之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此際正逢西歐展開著名之普法戰爭，法實無力派兵來華，李鴻章之回援京畿竟使中法以和平結案。全未料竟是逢凶化吉，天津教案之發生，對李鴻章言實是極其重大之機緣。²⁹

李鴻章在同治九年接任直隸總督以前，基本政治憑藉，權位格局，一則只是領軍大帥，具軍勢聲威。一則只是一員地方疆吏，當然尚遠不及曾國藩聲望與政治地位。實則曾李合作，互相聲援，自是兩利。然兩大軍系，人物眾多，必有齟齬，乃是常態，不足議也。

李鴻章自任直隸之後，合併三口通商大臣於一身，即為北洋大臣。清以拱衛京師責成李氏淮軍守禦大門，又以北洋大臣職司，助總理衙門與列強周旋。直隸總督兼掌熱河、察哈爾防務，軍事周顧北方邊防。北洋大臣兼管山東、遼東海上防禦，以至長江以北沿海礮台，在總理衙門定之為海防，亦當李鴻章全盤籌計。於是外交海防均須一肩擔任。由是職責權勢，已與前時大不相同，而眼光用心，自然要為全國大局作統籌謀畫。而李鴻章之政術運用，亦自可考見其大致脈絡。

²⁹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發生，背景曲折，情勢複雜，非本文所能述論。在曾國藩則為朝野冀望強硬，却使之焦頭爛額。曾氏自言，名已裂矣，身豈有不敗。世人所知其重要之省記有謂：「外慚清議，內疚神明。」此是對國內而言。更嚴重者，法國聲言用兵開戰，亦使清廷感到嚴重。此責自然落在李鴻章身上。李氏被召，立即自西安回援京畿，聲言馬首勢不復西。未料此時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亡，清廷立調曾國藩回督兩江，以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李氏督直一倚曾國藩和平政策，適因西方普法戰爭拖住法國，亦終以懲兇、賠償了結。此一重大轉折，無不有利於李鴻章，實為其後半生之一大機緣。

甲、湘淮兩軍系領袖之協同

近人論及湘淮軍系多能涉談湘軍、淮軍兩系表面合作，而自高層大帥起，彼此之間莫不有摩擦衝突。至少爭功委過之事，時有發生。此皆平粵平捻時期常見。史實均能見之。即當時曾國藩、李鴻章二人亦並聽到此類傳言，後世論者亦自易見。

光緒十年中法起衅，戰事延及閩浙台灣，而江南亦受法艦侵擾，時在長江軍幕之文士周家祿，致書友人朱銘盤，透露出駐地湘淮兩系各有意見，並憂心兵惰將驕，難有勝算。茲舉其言為據：

此間防務亦頗認真。惟湘淮界限似太分明。兼之防營將領無不攜帶眷屬。大敵在前，而將帥人人有顧身家戀妻子之意，則殺敵致果之心何自而生？非獨兵氣恐不揚也。劉南雲（湘將）蔑視法虜，謂不足當一戰。虛驕之氣勝，則戒懼之意少，蓋為弩末矣。³⁰

由此文人所論，具見湘淮兩軍系彼此之不協，已實是當年識者所共喻。然則若論湘淮領袖以至曾、李兩帥，雖明知彼此多齟齬，而面對國家政局情勢，兩方實必須彼此聲援，合作多過衝突。曾、李二人俱有此種認識，李鴻章接任直督之後，尤特拉攏湘淮兩系將帥大吏。想湘軍局面實大，而為平粵、平捻、平回、平苗，出力甚大，名將出生入死，實為浴血換來威勢。即令若干大將早死，而全般聲勢威名尚在。朝廷本是恤賞不泰，獎拔不優，而其位至總督巡撫尚不下二十餘人。淮系人物，連李鴻章亦只有五人位至督撫。湘淮自來不少摩擦齟齬，但李鴻章既承當國重任，仍必須拉攏其領袖共事。若左宗棠、曾國荃、彭玉麟俱是昔日敵對，李氏終須借重合作。湘軍最長期相合作者為南洋大臣劉坤一，俱出於李鴻章主動合作，互相聲援。最後直至李氏逝世。（劉坤一於次年 1902 年逝世）當知湘淮兩軍系支撐滿清政局直貫十九世紀後半五十年。論湘淮人物者，宜作參考。³¹

³⁰ 周家祿，《壽愷堂集》，卷二十八，頁7。全三十卷，民國十年印。

³¹ 關於淮系將帥重要領袖，可據馬昌華，《淮系人物列傳》（合肥：黃山出版社，1995）。

乙、科甲同年之要結

李鴻章帶兵起家，出身湘軍別枝，於運用政術，首須倚恃湘淮兩系領袖。此其根本可靠力量。惟既至高位，坐鎮京畿，肩負海上防務，承擔國防重責，只憑一位直隸總督地位，自見力小任重，朝廷固自信任，而其個人則須要結地方各省督撫。只靠湘淮領袖，尚覺有所不足，遂至進一步於地方大吏，更加深要結丁未進士同年及順天鄉試同年。

李鴻章在當時政壇，用心要結丁未同年（進士科），最早有李孟群在咸豐間任安徽大吏，鴻章曾相歸倚。繼在任兩江總督時而有同年劉郇膏接任江蘇巡撫。而同時有同年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及李氏回任湖廣總督時，馬新貽則任兩江總督。及至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尤須要結地方大吏。而最相契、最得力、最持久者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沈葆楨，亦為丁未同年，自光緒元年任至光緒五年病逝。為李鴻章在運用政術最成功之一時期。沈葆楨去世後，又有何璟及李宗羲任兩江總督（何璟後任閩浙總督）。大抵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勳威最盛，兩人配合最具成效，此則大有助於李氏之問政。此外之地方大吏較居次要者，有廣東巡撫郭嵩燾（丁未同年）及閩浙總督李鶴年（鄉試同年）。

除地方大吏外，李鴻章亦引重若干同年於近身任事。在屬下及幕府者有孫觀、陳鼎、陳浚，皆丁未同年，又有凌煥、蒯德標為鄉試同年。像李鴻章坐鎮北洋遙領朝政，由於翰林出身，與京朝官吏實更親一層，推行政務，甚需朝中有人相助。適自同治七年起，丁未同年沈桂芬任軍機大臣，對於李氏有極大幫助，故自益加結合，直至沈氏於光緒七年病故，自此使李氏失去重要內援。

綜觀李鴻章為清廷擔當重大政務，固足見李氏才識眼光，忠誠謀國任事，而朝中地方尚須彼此合作，倚恃科甲同年，自當是其一種重要憑藉。

丙、中樞內援

清代地方督撫，與滿人將軍，俱承朝廷之命，各為一方之長，全般政務財稅俱能主政。惟不握兵權，僅只保有督標、撫標少量兵力。總督必擁有兵部尚書銜、巡撫必擁有右都御史銜，而實際決非京官而係地方官。惟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南方設有南洋通商大臣，為兩江總督兼領，北疆設有北洋大臣為直隸總督兼領。沿海各省，亦必受其節制。如此可知南北洋兩大臣之管轄權乃至承擔職責自有所擴張。勢須由勳威重臣擔此職務。是以在晚清政局中，由於通商外交頻繁，遂使南北洋大臣成為中樞所畀賦更多政務與權力。國是機要亦多會向南北洋大臣諮商。

李鴻章得與朝內樞臣直接建立關係，實必在接任江蘇巡撫之後。有能力專摺奏事，可能因幼主同治特別是慈禧太后識賞，方可謂有了朝廷器重機會。事實上，朝命所出俱出軍機大臣代皇上畫策擬旨，自然是全由軍機處主政處理，而議政王奕訢為首揆。凡其建言，太后自必聽信，是以京中權貴，恭親王奕訢為最重要。李鴻章自同治元年任江蘇巡撫，用滬平吳，至同治三年江蘇全境光復，受上賞晉爵一等肅毅伯，其同時期曾國荃以克復金陵晉爵一等威毅伯，左宗棠以光復浙江晉爵一等恪靖伯。凡建大功無有不受朝廷重視之理。蓋知李鴻章建立樞廷內援，當知自同治三年。

南方平定之後，未料京畿倚為長城之僧格林沁被捻眾殺害於曹州，京師震動，乃有先後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北上中原各省剿捻。雖又平定東捻西捻，再建大功，然清廷升賞不厚，各軍將領難得晉升五等爵。而京師重地則調曾國藩接任直隸總督，借其威望鎮懾伏莽。終因同治九年發生天津教案，法國脅以開戰，遂即調李鴻章接任直督，曾國藩回任江督，則須靠曾、李威望維持大清政局，二人得清廷倚重可知。

當然中樞大臣主國政者，原是恭親王，中間光緒十年至二十年為禮親王世鐸。惟只恭親王在朝支持李鴻章，禮親王並不支持。但此期間成立海軍衙門，有醇親王奕譞主持，勢須倚靠李鴻章為其出力，自然倚信。後來恭親王復出，但李鴻章已因甲午戰

敗失勢，在朝在野均已不居重要地位。直至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李氏復被重用，擔任對外交涉，以至簽訂辛丑條約，而大局即定，李氏亦同年逝世。

實際上中樞軍機大臣有實力支持李鴻章者只有三人，即文祥、沈桂芬、許庚身。而以文祥為有眼光充分信重李鴻章。而於其他新政領袖若曾國藩、左宗棠、沈葆楨，亦同加倚重，凡事諮商。多倚重諸人獻策，惟倚信李鴻章最深。

在樞廷內援而言，自同治初年以至光緒二年，李鴻章是最受文祥信任與倚重，尤其李氏接任直督以後，多以天津為駐地。身雖在外官，而不時派人至京與文祥聯繫，查李氏《朋僚函稿》，看似與文祥通信並不頻繁，實則派其親信幕僚屬吏直到北京致意，可知者有遣道員孫士達（字竹堂）以及知府許鈴身（字仲弢）前往北京見文祥。一直推重文祥之忠藎謀國，具遠見而識大體。可舉其致友人孫衣言（字琴西，李孫二人乃順天鄉試同年）函，於文祥去世後，至表惋惜。其函云：

當軸風氣，往往見賢而不能進，見不善而不能退，此類是已。上下相忍為國，習為和同。有立異者，則必推而遠之。不但無總攬事權通量四海之才，即有其人，亦不容於今之朝矣。潞公（宋時文彥博為潞國公借指文祥）較有力量，昨又物化。外侮日深，專侍筆舌支吾，如何能久？³²

李鴻章之敬服倚仰於文祥，亦見於後人之載述，如劉秉璋之子體仁記於《異辭錄》有云：

費莫氏文忠公字博川（即文祥），為先文莊（即劉秉璋）朝殿之師。每見敬禮有加，稱譽不容於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雖恭王當國，皆公贊襄之功。及卒，李文忠（李鴻章）歎曰：「旗人中麟鳳也。」傾服如此。³³

³²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致孫琴西方伯」，頁16。

³³ 劉聲木，《異辭錄》，卷二，頁51。

其後之各種述論文祥之文，其重要者尚有辜鴻銘之文集，以及今人魏秀梅所撰之研究論文。要以魏氏之文最能全面通觀，足以概其生平。³⁴

光緒二年之後，中樞內援，李鴻章則多倚恃丁未同年沈桂芬。沈氏卒於光緒七年，李鴻章則轉而結納軍機大臣許庚身，而許氏卒於光緒十九年。接着二十年即遇中日甲午戰爭，李氏從此失勢，直至光緒二十七年逝世。惟光緒十年後有張之萬任軍機大臣，與李鴻章為丁未同年又是狀元，但對李鴻章遠不及許庚身之出力相助。張之萬似未能具有權柄，亦如同官之額勒和布，只是備位一員而已。所以李鴻章之中樞憑藉，大要以文祥最為得力，次為沈桂芬，再次為許庚身。

五、結論

近代之史，主體始自鴉片戰爭，情勢複雜，相關人物甚多，各自學問職能不同，而世變紛乘，問題殊多。在史家言，不易通盤總攬，統論全體。則通博自難周至。就史實之叢集，內亂紛擾，外患猥集。實亦難作條理，一一詳加探究，能致專精一門亦屬不易。惟除大師郭廷以循博通之路而著《近代中國史綱》，我輩後學自莫不循專精之路，而研究一枝專門史事，志求專精，亦多能著書問世，供世人參閱。而人物研究自是輕易見可專治之一途，則人物傳記之作頗見優先。

鄙人之學術文章著作，多重在大事專題，而論人物文章亦尚不少，除孫中山一人寫有二十餘篇之外，其他人物亦有十餘位，惟一向不寫人物傳記。今之談論李鴻章亦不算傳記類。惟鄙人因編書而寫人物小傳者不下百餘篇，俱不得待之以學術著作，決不同列著作之中。

今世研究李鴻章者亦聖之時者也。惟李氏傳記已有數家，不敢追摹，亦自量其傳難寫，無人從事，故而選此一題，提供同道

³⁴ 魏秀梅，〈文祥在清代後期政局中的重要性〉，《台灣師大歷史學報》，期32（台北，2004.6），頁121-146。

參閱。

向日治學，曾早草成《淮軍志》一書（1967 年完成），得劉廣京前輩鑑賞而為之作序。此後劉先生屬命宜再續寫李鴻章一生中各類問題，於鄙人鼓勵教導不遺餘力。多年以來深深懷仰劉先生厚愛深意。昔時寫《淮軍志》前後用四年研究時間，接著注意湘軍人物曾國藩、胡林翼而於湘軍亦用功力不少，而輯為成書《清季軍事史論集》。繼之思考湘淮兩系實為晚清地方具有聲勢與影響之政團。方始想到處理此種問題，而採李鴻章之政治機緣以入手。此題早已擬定，却並未告知劉先生，一味搜輯資料，頗為遷延時日，未料劉先生於數年前逝世，吾之論李鴻章文尚未着手，真是對不起劉先生之諄諄屬命，寫此以作追念懷仰劉先生之作，以為報稱。

美國史學界近代史學者包括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芮瑪麗（Mary Wright）、劉廣京、龐百騰（David Pong）等教授，俱頗重視同治中興之史，定此為「同治中興」一個重要領域。我輩台灣學界，則是向未涉談。其實大體觀察，中樞之恭親王及文祥，地方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此五人實是清朝中興政局之支持柱石，其中要以曾國藩為最重要，李、左、沈出於曾國藩所荐舉提拔，丁日昌出於李鴻章所引重。而中央樞廷則有文祥作內援支持，維持政局，略能穩住數十年，自可謂之中興。

惟是曾國藩於同治十一年逝世，其後則靠所荐舉之李、左、沈，沈氏則於光緒五年病逝，左宗棠於光緒十二年病逝。則李鴻章一直任事至光緒二十七年。而十年後清亦亡國，想見走上人亡政息。中樞恭親王死於光緒二十四年。從大處看，歷史頗能提早予人教訓，具見美國史家頗能見其大，不可罔忽也。

李鴻章之悉心運用政術，非為一己，乃為清室安定，亦為國家安定。世人識解李氏勳威之隆、權勢之大。其實說不過是為滿清王室看守大門，保疆宇，而又不付予真實權位。比起王爵有十六階俱在李鴻章之上，決未付予全國性大權。只是直隸總督北洋

大臣，若不運用政術，怎能進而辦事，非辦李家之事，乃是國家大事。李氏晚年說出，一生為國家彌縫急難，那裡能說到建樹？是李非能見之能言之，而係朝內地方均有掣肘羈絆。實則李氏一生之中，才不能展，志不能伸，至晚年而說出無奈。背下萬世罵名，豈有不知？寫此供世人參考，一人身後，任憑人說。願史家知所斟酌。³⁵

2012 年 4 月 20 日

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

補記：

拙著四月寫成，承同道名家兩位資深近代史學者，加以審閱評鑑，俱承善意通過，好心指教，實所欽感。在此作補記，既為補充疏漏不明之處，亦為申解質詢疑義之點。評者耐心閱讀拙文，務祈並讀此處補記。在此尤當感謝兩位名家指教之功。

第一，首先就評審所抉發之具體易見的錯字看，拙文錯字大排長龍，兩人舉出很多，俱經一一照改。可證兩家閱讀之細心，相形鄙人之粗心。只有一字未改，蓋「爭功委過」委字不需作言字旁。

第二，在此把兩層質疑問題，一併在此解答。一在修辭，有句意不明，易質誤解者。我將在此解答所疑，不將本文改動，自以補記為準。

重大啟疑之點，在於人物彼此關係係。審議者有精要突出之質問，勢須詳加剖判。

二者合併回答，亦非混水摸魚，實當一一分條說明，分點開呈於次：

1、拙文多處提及湘軍各枝將領統兵不過三千五千七八千，而絕少逾萬，後來又提到曾國荃所帶逾萬，竟達於五萬以上，李鴻

³⁵ 李鴻章晚年自述其生平任事之艱難困頓，有負於國家。可見之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四，載《中國文史叢刊》（香港：靈文書屋，1969）。

章所統原只六千五百，而亦竟達五六萬人，左宗棠原只數千而後亦達五六萬人。在此補交代一個界綫。整體而言，咸豐十年以前湘軍將帥統帶甚少逾萬，只有在十年這一年曾國藩已任兩江總督欽差大臣，此年曾國荃圍攻安慶，城大而堅，始將兵力增至萬餘人。

咸豐十年以後，鮑超、多隆阿、李續宜各大枝俱遠達萬人以上。提出咸豐十年界綫，此一答案即可成立。

2、當同治三年夏四、五月曾國荃圍攻金陵，苦戰不下。評者質詢此時曾國藩如何思考李鴻章帶兵來助攻之事。即是尖銳問題，亦是讀者懸解，我的解釋不明，自必成為懸疑。主要壓力來自朝廷京中群望早日攻下金陵，乃是有諭旨下曾國藩令他促令李鴻章帶兵來援。曾國藩本心豈望李鴻章來助？而朝命不能違背，豈敢抗旨？向李鴻章傳諭而來助戰，無法明言不要，但看李鴻章是否明白人，為報舉立之恩，此是良機。李鴻章果然按兵不來，且向朝廷頂奏。一說在滬久戰傷殘須加刪整成軍，不能立即應戰。一說入夏洋槍大砲火器動輒爆炸，反不便於用兵。總之被其搪塞過去。拖到曾國荃克復金陵。曾李原有齟齬，至此乃被化解。

3、本文論及李鴻章樞廷內授，對於我已講明文祥之倚重李氏，亦說到李氏任直督後，與文祥有密切來往，所派北洋幕府親信是許鈴身，字仲弢，有李氏《朋僚函稿》文證。惟有一點重要之京中官員傳說，言道當李鴻章血戰打捻，平東捻後，朝廷只授給協辦大學士。可見升級不易。惟自同治九年八月任直隸總督，不過為時二年在同治十一年之大躍身越過體仁閣、東閣、文淵閣三階直升武英殿大學士。似此高層勳位，皇帝太后之外，只有恭親王可以力保。而恭親王力保，自必由其軍機各大臣，亦能力保方可允予推荐。自必因文祥之推舉而來，其他軍機俱不能說動恭親王。莫不看武英殿大學士，曾國藩畢生只做到此席。同治十一年曾氏亡故，朝廷即將遺缺由李鴻章接補。更明顯之事，乃是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其時皇帝已駕崩，文英殿大學士論者俱位當由

文祥補其位。而文祥謙讓，推荐李鴻章任文英殿大學士。此點即正證明文祥之十分推重李鴻章。

4、審評者以為拙文講到內授之許庚身，光緒十九年去世，李鴻章光緒二十年政壇失勢。會使人誤解，李之失勢與許氏有關。此點無須補解，蓋光緒二十年甲午戰起，李氏削職失位，人人俱備此一常識。怎會拘泥至此地步？

但是論及李鴻章內授而與許庚身要結，拙文交代不明，仍會存在質疑。在此補解。

同治九年（1870）八月李鴻章轉任直督。重任在辦理天津教案，防備法軍入侵。李氏蕭規曹隨，並不主戰，照曾國藩策略以和議解決問題，決計不以兵戎相見。其時許庚身同治元年（1862）進士，乃科甲後輩，乃在同年九月與李鴻章通信，鴻章有信論及整軍備禦之策。在信之最後，提到「仲韜有否到京」。（據《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第 25-26 頁，復許星叔）信中重要人物仲弢即是許鈐身。鈐身乃許乃普之子，許乃普曾官至兵部、工部、吏部等尚書，是鴻章前輩。但許庚身、鈐身並非同族，俱生長在杭州府。庚身藉仁和，鈐身籍錢塘，時在李鴻章身邊為重要幕僚。亦在當時丁日昌、應寶時與法人談和之幕賓。李鴻章與文祥來往，亦派許鈐身代其到京見面。鈐身以其父親乃普之京朝關係，代表李鴻章到京要結內授，其時許庚身方是小官，已在其拉攏之列，而後入軍機處即成可靠內援。

5、承詢及慈禧太后對李鴻章看待如何。很難簡單答復。基本上滿清政府體制是皇帝大權獨攬，而在同治年起，實是慈禧掌握大權，世人共知不須陳說。政體上雖是太后皇帝為政權所在，但自雍正起創出一個軍機處，並一直傳承至清末。軍機處由皇帝選用親信大臣數人參入，稱為軍機處行走。而只是皇帝秘官性質，只能代閱章奏並為皇上擬旨，不能發號施令。名稱為相，實非宰相。但皇帝天下，政令俱由軍機處發出，全作密件，稱為「軍機處字寄」或「軍機大臣字寄」，而內容則只能是皇帝上諭，但凡普通行公事，其諭旨由內閣發出，號稱「明發上諭」。亦是內容多

樣。抑且往後比「軍機處字寄」要晚數日，均被視為正式官方日期。但凡各朝軍機大臣，必以一位親王主領各大臣參預國家政務。

如上所述，太后皇帝所要見者是軍機大臣，所倚重者是軍機處領班之一位親王，在同光時期則是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有時間先後）。在此可以正式回答，無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並不直接對太后皇帝負責亦無資格見面。今人多不知像曾國藩這樣兩廣任欽差大臣，是正確無誤的代國家統兵平亂之大員，他一生中只入朝陛見太后及同治皇帝一次。（只有一次，沒有兩次）左宗棠奉命平陝甘回亂曾在同治七年陛見一次。至同治十二年平定陝甘，光緒四年收復新疆，回京之後，亦只再陛見一次。李鴻章不例外，亦只在同治七年陛見一次。（鄙人預計將來在《國史通訊》上介紹一下「晚清大臣陛見」以供各家參閱）因此鄙人只能相告，慈禧太后對李鴻章如何看待，史家是談不起來的。

史實可肯是作正確判斷提出論斷者，並非難事。鄙人報告，自同治元年起，滿清政權是一定要倚靠湘、淮將帥為之維持國家安定，此是別無選擇之途。綠營八旗已不足恃，自同治元年起即起用湘軍百戰名將劉長佑任直隸總督。直至同治六年由滿人官文接任，官文亦是平太平天國為湘軍之後援總兵。同治七年即由曾國藩接任，同治九年由李鴻章接任直至光緒二十年甲午戰敗去職。此是為了北方京畿重地，須有靠湘淮將帥代為守衛，無論慈禧如何想，大勢所迫，不得不如此安排。此處大而代之，不能太細交代。

至於長江以南，也須全靠湘軍將帥擔當重任。則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自咸豐十年由曾國藩擔任，至同治四年由李鴻章擔任，同治五年末至七年由曾國藩回任，同治七年改用文官馬新貽接任兩江總督，同治九年被刺身亡，又調回曾國藩第三次接任，同治十一年曾國藩病故，曾氏卒後先由李鴻章同年何璟署任，十一年因丁憂由江蘇巡撫淮軍名將張樹聲署任，至同治十二年改由另一

李鴻章同年李宗義接任。同治十三年李氏因病解職，至光緒元年改由李鴻章另一同年沈葆楨實任，直至光緒五年病故。改由湘軍百戰宿將劉坤一接任。光緒七年改由左宗棠接任，直至光緒十年因病解職，次年左氏病故。光緒十年七月由曾國荃接任，直至光緒十六年十月病故，繼由劉坤一再接任江督。劉氏久任十餘年，光緒二十八年（1902）病故。劉氏卒後接任者魏光燾連任至光緒三十年（1904），其實魏光燾乃是隨左宗棠削平西北回亂有名戰將，但以道員起家。光緒三十年由李興銳接任，李亦湘南人，先是劉坤一在職期間稍離駐地，三次俱由湖廣總督張之洞署任，而張氏自認有資格接任江督，却輾轉易人，俱出湖南，大為憤憤不平，向人言，兩江總督似已賣給了湖南人。

看來晚清政權朝廷自明見國勢覆喪，政權焉能穩固？自不免一意倚恃湘淮宿將，藉以維護穩定。明眼可見，當可據以宣白後世，敢冒立論責任。

6、承詢及李鴻章與翁同龢關係，在清代當年共識，朝野俱傳翁李不和，大抵多可聽信，翁同龢近為帝師，光緒倚信甚專，而翁對李鴻章遇事為難，絕不協同。甲午之戰翁氏一意主戰，李鴻章一敗塗地，落職失職，實合翁氏之計慮。其情隱晦，無法在此考辨。清人王闓運及吳永之書頗有透露兩人思怨糾結，亦無法引來暢談。小說家今時名家高陽熟論翁同龢故事，乃小說家言，想像構造，並無故實。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邀請高陽講演兩場，一場講《紅樓夢》，在文化研究所，由所長陳方正博士主持，我當到場。另一場講翁同龢與光緒帝變法，在大學教室，校方委我主持，高陽負大名，豈知我是何方神聖？大談光緒罷黜翁同龢之後，又要安排起復。在場者尚有中文系吳宏一教授，認為是推測虛造，毫無根據。鄙人主持，當場不表意見，事後亦未置論。到今文說到翁同龢起復，不可信翁李不和，本有史據，亦有前人筆載。亦當不加置論。

7、承詢李鴻章與張之洞二人間關係若何？答案簡易。他二人既無事業之合作協同，亦無人情之恩怨摩擦。有可靠記載，張之

洞在湖廣總督任中，常派有駐京專人王秉恩（字雷澄）隨時探聽朝中重要舉措，王氏常見李鴻章攀談，自是打探消息。李氏豈不知他是駐京坐探，却必告知一些朝廷舉措。王氏呈報張之洞，事後得見到某省督撫授任果如李氏所預示。相信此是李鴻章明知王氏因何切近，故意告知有把握之訊息。可以折服張之洞這老狐狸。

最後，要感謝評審先生費神用心細讀拙文，特別判定，稱拙文是通論性之作。真是高明見識。拙文自是宏觀而非微觀，必須不蔓不枝，定準主題，一氣呵成。人事豈無齟齬，權貴豈無爭較。心性豈一隸，作為豈能雷同。宏觀論史，決不能一一照顧，件件註解。此篇補記雖費不少篇幅，仍不能做到周全。仍俱未能深解，尚祈同道方家寬諒為禱。

2012 年 9 月 17 日

The Lucky Situational Coincident in Li Hung-Chang's Political Career

Wang, Erh Min

Abstract

Li Hung-Chang was a prominent character in the political field in the late Ch'ing.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his rise which is not so smooth after he was defeated by the Taiping Army. However, by meeting advantageous external chance and owning personal insight, he earned good fortune and high achievement at last. Therefore, ch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 official career.

Uprising in Guangxi in 1850, the Taiping Army expanded quickly, disturbed several provinces and occupied Nanking as capital. Li accepted imperial order to train army in his hometown. He must conscript soldiers and raise salary to defend his native place. However, he was failed by insufficient manpower and money.

Li casted the dice to rely on Tseng Kuo-Fan's Hunan Army and assumed as his staff. At that time, Hunan Army was frustrated also. The Government's Army suffered a defeat in Nanking. The Court must depend on Tseng Kuo-Fan. The Hunan Army could develop further by Tseng's position as Commissioner and Governor of Jiangsu, Anhui and Jiangxi. Li was recommended as Governor-general of Jiangsu. The Nien Army extended their force in Northern provinces and killed the commander-in-chief Senglinxin. While Li was appointed to expedition the East Nien and the West Nien, Tseng was assigned as Governor of Chi-li. As the Tienjin Accident happened in 1870, France acclaimed to send army to China. The Court moved the Huai Army to defend the capital in a hurry and appointed Li as Governor of Chi-li. France couldn't resort to forces in the East because the bursting out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Li solved the accident in peace.

Li was in charg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at the same time for 25 years. Knowing that China must exercise reformation, he only discussed with Ding Ri-Chang and didn't suggest to the Court. He undertook heavy responsibility but without real power, therefore, he should not be blamed for the failure to face the foreign affairs in the late Ch'ing.

Key words: Late Qing, Li Hung-Chang, Zeng Guofan, Huaijun, Xiangjun

